

## 三星堆博物馆

# 述说瑰丽的古蜀文明

本报记者 刘裕国



金面罩青铜人头像

### 灿烂的古蜀文明

走进综合馆（一展馆），由六大单元构成的800多米长的展馆线上，陈列着陶器、玉器、骨器、金器和青铜器等上千件文物，全面反映了古蜀国农业、商贸、手工艺水平，生动再现了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末周初灿烂辉煌的古蜀文明。

在“物华天府——三星堆农业与商贸”单元，一块典雅的玉璋吸引了记者的目光。它线条流畅，色泽光亮，长92厘米，是目前我国商代考古中发现的形体最大的玉璋。据博物馆讲解员介绍，它的制作难度极大，厚度仅6毫米，刃口部分虽薄却犀利如新，下端柄部两侧有加工精细的多齿形扉棱及镂空花纹。其制作工艺之精巧，令人叹为观止，堪称三星堆玉石器中的一件国宝。

除了玉石饰件，展厅陈列的众多酒器及各类家养动物造型器物等，说明当时的农业已有相当水平，家畜饲养也具备一定规模。海贝、铜贝、漆器、青铜人像的服饰等物品，反映出当时商贸之盛况。此外，还有各种小巧精致、颇具神韵的人物与动植物造型陶器，展示了成熟高超的制陶工艺，体现了古蜀人的生活情趣与审美风尚。

馆内展示的金器和青铜器，是三星堆冶金工艺的代表。三星堆古蜀国冶金术在商代中后期已达高度成熟，其合金配置水平和金属冶炼技术堪与同时期的商王朝相媲美。三星堆青铜器工艺繁复，造型精美，达到了当时范铸工艺的最高水平，其风格汲取商文化元素而又表现出强烈的地方民族个性。三星堆金器以捶拓、模压、粘帖、雕刻、镂空为主要技法，不仅种类丰富，量多体大，且制作精巧，应是作为权力象征而用于隆仪或祭典的重器。其中，金杖、金面罩等文化形式较为接近西亚近东文明，据此推测，商代中国西南地区与南亚、中亚和西亚地区之间已存在文化交流。



玉璋

在三星堆出土的黄金制品中，形体最大、最富特色和代表性的是一号坑出土的金杖。金杖全长1.42米，直径2.3厘米，是用重约500克的金皮包卷在木杖上制成，出土时，金皮内还有碳化的木渣。这件金杖是我国夏、商、周三代考古中目前发现最大的一件黄金制品。在金杖的一端，有一段长46厘米的图案，通过放大的线描图可以看出：下方图案为两个头戴五齿高冠、耳戴三角形耳坠的人头像，笑容可掬；另外两组图案为两头相向的鸟和两背相对的鱼，在鸟的颈部和鱼的头部叠压着一支箭。有学者推测，这段图案可能表现的是以鱼和鸟为祖神崇拜的两个部族结盟，建立了三星堆古蜀国，渔猎曾作为当时的经济生活手段。也有学者认为那是“穗形物”，反映出当时较为发达的水稻种植。

综合馆的压轴展品是大型青铜通天树。它造型奇异、风格瑰伟，体现了高超的冶铸技术和艺术水平。博物馆讲解员风趣地说：“这是三星堆先民创造出的古代航天工程，因为它是通天地的。”

青铜神树由底座、树和龙三部分组成，通高3.96米，是我国迄今所见的青铜文物中形体最大的。铜树底座呈穹窿形，其下为圆形座圈，底座由三面弧边三角状镂空虚块面构成，三面间以内撇（yè）势的三足相连属，构拟出三山相连的“神山”意象，座上铸饰象征太阳的“☉”纹与云气纹。

讲解员介绍，关于这株铜树的内涵，目前学术界存在不同看法。有专家认为，它与《山海经》中记载的“建木”相关，铜树是古蜀人沟通人神、上下天地的天梯，反映了古蜀人交通于天人之际的特殊宗教权力被古蜀国神权政治集团所独占的情况。也有一种观点认为，铜神树为古蜀人的宇宙树，反映了他们的世界观。还有人认为，青铜神树起源于古人对日冕现象的认识，代表东西两极的扶桑与若木。

### 神秘的青铜王国

行至青铜馆，三星堆管委会主任、三星堆博物馆常务副馆长朱家可对记者说：“三星堆的青铜器堪称一部雄奇壮阔的心灵史诗，将古蜀人的精神生活写得淋漓尽致，为探索人类早期政治组织、社会形态演化提供了很好的样本。”

青铜馆的第一个展厅即面具厅，透出一种独特的神秘氛围。讲解员介绍说，以纵目面具为代表的青铜面具群，是三星堆最有特色、最具精神文化内涵的文物类型之一。三星堆遗址共出土青铜人面具20余件，这些面具均与人脸“三庭五眼”的标准比例不合，五官的夸张正是为了拉大与现实的距离而凸显其神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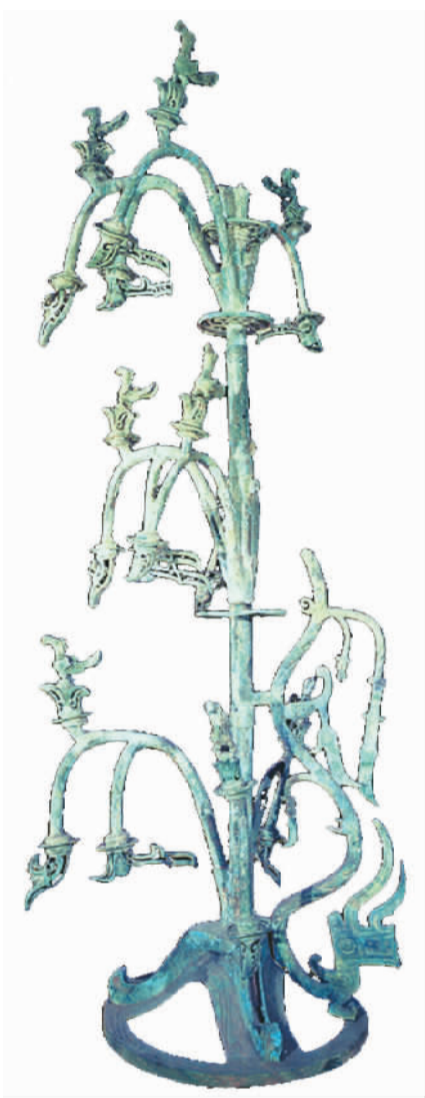
眼前这具商代青铜戴冠纵目面具，造型十分奇特。面具双眼眼珠呈柱状外凸，向前伸出约10厘米，双耳向两侧展

嘉木葱茏，岛影湖光，在四川德阳广汉市鸭子河南岸的“三星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东北角，坐落着三星堆博物馆。三星堆遗址是中国西南地区迄今发现的范围最大、等级最高、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1997年建成开放的三星堆博物馆则是一座现代化专题性的遗址博物馆。

三星堆博物馆现设两大展馆，第一展馆（综合馆）主题为“灿烂的古蜀文明”，重在展示古蜀社会物质生活；第二展馆（青铜馆）主题为“青铜铸就的人间神国”，旨在揭示古蜀先民的精神世界。展馆建筑外形追求与地貌、史迹及文物造型艺术相结合的神韵，一展馆为半弧形斜坡生态式建筑，彰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文精神，二展馆为三部一体的变形螺旋式建筑，其整体具有“堆列三星”与“人类历史演进历程”的双重象征。

三星堆文明作为长江上游地区古代文明的杰出代表，印证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性，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和“世界第九大奇迹”。三星堆博物馆集中展示了古蜀王都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珍贵文物，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

7月，记者再次走进三星堆博物馆，心中依然充满神秘和敬畏。



青铜神树



青铜大立人像

开，夔（kuí）龙形额饰高出79厘米，面具横断面呈“U”字形。据说，该面具出土时尚见眼眉描黛色，口唇涂朱砂。有专家认为，面具的眼睛大致符合史书中有关蜀人始祖蚕从“纵目”的记载，由此判断它与神话中“人首龙（蛇）身”“直目正乘”的天神烛龙有关。

三星堆出土的一批青铜人物造像可谓绝世精品，它们既是神灵的象征，又是人间统治集团的代表。商代青铜大立人是三星堆文物中又一件举世瞩目的重器。它通高260.8厘米，分人像和底座两部分，人像高180厘米，头戴高冠，身穿窄袖衣，脚戴足镯，双手环握中空，环抱胸前，形象典庄重严。它似乎表现的是一个具有通天异禀、神威赫赫的大人物正在作法。

在三星堆众多的青铜雕像中，不论从服饰、形象还是体量等方面看，这尊大立人像都堪称它们的领袖人物。朱家可说，关于这尊大立人像的身份，学界有几种不同意见。“我们倾向于认为他是三星堆古蜀国集神、巫、王三者身份于一体的领袖人物，是神权与王权最高权力之象征。”

青铜馆还展示了青铜太阳轮、青铜鸟脚人像、青铜神坛等奇妙诡谲的青铜制品。透过这些文物，可以窥见古蜀先民的精神世界，领略古代造型艺术的动人魅力。

### “活起来”的建馆之路

三星堆遗址已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其历史、文化、科学价值可与同时期北纬30度上的古希腊、古埃及、古巴比伦等世界古文明媲美。作为遗址文化的主要载体，三星堆博物馆开创了一条创新发展之路，让文物“活起来”“走出去”，让三星堆成为巴蜀文化的闪亮名片。

朱家可介绍说，三星堆博物馆筹建之初，就明确提出“馆园一体”的办馆理念，采用“建筑、文物、陈列、园林”四位一体的布局，将文博事业与旅游产业结合，使遗址保护与利用相得益彰。

三星堆博物馆是国内首家引进并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和绿色环球21全球旅游可持续发展标准体系认证的博物馆。从1997年开馆至今，三星堆博物馆已接待中外游客2000多万人次，接待国内外政要近200人次。三星堆文物以文明使者的角色，赴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英国、日本、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展出，影响甚巨。2017年由四川省委宣传部主办的“古蜀文明全球巡展”在西班牙马德里开幕，三星堆古蜀文明再次作为四川文化外交名片惊艳亮相，开启了新一轮全球巡展序幕。

关于三星堆和古蜀文化，还有一系列未解之谜有待深入探索和研究。三星堆博物馆与科研机构和高校密切合作，通过举办学术研讨会、建立三星堆研究院、创办学术刊物《三星堆研究》等方式，推出了一批富有影响的学术成果，建立起了自己的学术人才队伍，文物修复、化学保护技术也日臻成熟，博物馆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升。

三星堆博物馆还积极运用新媒体传播手段，与网友互动，成为文博界的“网红”。三星堆官方微博粉丝数已达到380余万，获得“2017年度十大文博影响力官微”称号。

朱家可表示，下一步将围绕推进三星堆成为世界旅游目的地和世界古文明学术研究高地两个定位，着力构建三星堆古蜀文化传承传播体系，推动三星堆古蜀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断提升三星堆博物馆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让三星堆在当代焕发更加灿烂的光彩。

（本文配图除署名外均由三星堆博物馆提供）



青铜鸟身人首像

范立摄

佛教石窟是分布在丝绸之路上的艺术明珠，从南亚印度的阿旃（zhān）陀石窟，经中亚阿富汗的巴米扬石窟，到中国新疆的克孜尔石窟，可以管见佛教文化流传的历程。

石窟寺艺术在藏传佛教中也颇为兴盛。如被称为“吐蕃第一窟”的拉萨药王山查那路甫石窟，是重要的早期石窟寺遗存。在四川、青海等地，也有一些重要的藏传佛教造像。但在青藏高原之外，规模宏大的藏传佛教摩崖造像群极为罕见。辽宁海棠山的摩崖石刻造像群，可能是一个孤例。

海棠山，位于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大板镇，为医巫闾山之支脉，是蒙古高原到辽河平原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地理位置极为重要。

## 海棠山摩崖造像群

——丝绸之路上的佛教艺术瑰宝

□景天星



海棠山摩崖造像

网络图片

早在元朝时期，蒙古族就已信奉藏传佛教。17世纪初，蒙古贞部落从呼和浩特迁至阜新，藏传佛教也随之传播。明崇禎三年（1630），即皇太极天聪四年，皇太极邀请乃济托音呼图克图在蒙东传法，并建瑞昌寺，此为阜新历史上第一座藏传佛教寺院。此后，阜新地区陆续建有喇嘛庙369座，共有喇嘛5万余人。其中，规模最大的寺庙便是普安寺。

普安寺所在的海棠山有很多裸露的岩石。藏传佛教传入海棠山后，依天然岩石之形状，在岩石上雕刻佛教造像与题记。据载，在不到300年的历史中，共刻有造像1400余尊。迄今仍保存有龕刻183龕，造像270余尊以及汉、满、蒙、藏文佛教的题记50余处，集中分布于南区、中区和北区三个区域。

漫步海棠山，如进入佛国，眼前呈现出多种多样的摩崖造像，有佛像、佛母像、菩萨像、度母像、护法像、人物像等，其中护法像数量最多，有22位。造像的形象千姿百态，有的慈眉善目、面露微笑，有的慧目圆睁、呈忿怒相，有的结手印，有的持法器，有的站立，有的禅坐。

从雕刻数量看，无量寿佛雕刻最多，有35尊，反映了世俗生活中人们长寿的愿望。从雕刻尺寸看，造像有大有小，其中最高的是佛祖殿的释迦牟尼佛，有4.60米，最低的是犀甲护法眷属，仅0.15米。从造像题材看，几乎全是格鲁派的崇拜对象，居于中心的宗喀巴大师像刻于全山最高处。从龕窟形制看，以平面竖长方形浅龕为主，龕楣多是拱形或方形，其中也有不少塔形龕。从雕刻手法来看，多是选择天然石头在岩面雕刻，且多为浅浮雕造像，也有一些高浮雕、线刻造像，还有的造像采取浮雕与线刻相结合的方式。

普安寺寺主一希仁波切认为，海棠山摩崖造像布局最奇特之处，是三大区域的所有造像均以海棠山峰顶的宗喀巴大师造像为中心，并依格鲁派上师粮田的布局次第雕刻而成。南区、中区和北区的造像依次排列，井然有序，围绕着宗喀巴大师像，有广大行派的弥勒菩萨，深见派的文殊菩萨，代表清静传承的普安寺第一世、第二世、第四世活佛，还有密宗四部即事部、行部、瑜伽部、无上瑜伽部的本尊护法与传承诸师等。布局严整的造像群，将海棠山筑成一座密宗摩崖坛城。因此，海棠山也被认为是中国密宗名山。

在艺术风格上，海棠山摩崖造像继承了北齐造像的风格，表现出北方少数民族淳朴健壮的形体美，同时借鉴了晚唐造像的风格，体态丰满健壮，胸腹隆起，上着帔（pèi）帛，下着长裙，此外，还彰显出蒙古族、藏族的艺术特色和审美情趣。

如中区第107龕的文殊菩萨，头戴五佛冠，顶发髻，面形圆润饱满，眉间有白毫。双耳垂肩，戴大耳珰，耳边宝缯向上翻卷。佩珠宝璎珞，戴手镯、臂钏、脚环。帔帛搭肩绕臂，于身体两侧翻卷，帔带绕双腿，于两侧又向上翻卷。腰佩佩带，左手于胸前持经书，右手高举，紧握智慧剑。结跏趺坐于莲台之上。双层圆形头光与背光。这一菩萨像在体现晚唐造像艺术风格的同时，又具有浓郁的蒙古族特色。

古代工匠还运用矿物质和植物质两种天然颜料对造像进行彩绘，使其具有耐腐蚀性，故部分造像虽历经数百年风雨，仍能看到当年的斑斓色彩。如中区第2龕度母三尊像中的绿度母，至今面容仍呈绿色，笑容超然，饱含慈悲。

题材如此多样、规模如此宏大、布局如此严整的海棠山摩崖造像究竟创作于哪个年代，是学术界非常关注的问题。当今学术界基本的看法是：摩崖造像艺术创作于清代，但具体始于哪一朝，却有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康熙二十二年建庙的同时，就已开始雕刻造像。另一种观点认为，先有寺庙后有造像，如李翎认为“可能于乾隆年间约18世纪70—80年代已开始造像”。还有学者认为，道光年间开始雕刻造像，这主要是因为道光年间的石刻题记比较多。

一希仁波切依据中区第16龕“关公像”后的方形印章判断，这尊塑像应该是在康熙帝册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这一时期雕刻完成的。兰州大学杜斗城教授认为，在藏传佛教传入此地之后，人们可能就开始雕造佛像了，只是当时没有留下名字和年月。至于康熙以来修建的木构殿宇，应该是海棠山的佛教活动有了一定影响之后才开始建造的。

海棠山摩崖造像群见证了清代藏传佛教在蒙东和辽西地区的传承、发展和繁荣，是一座鲜活的蒙藏佛教历史、文化与艺术的博物馆。

（作者单位为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

